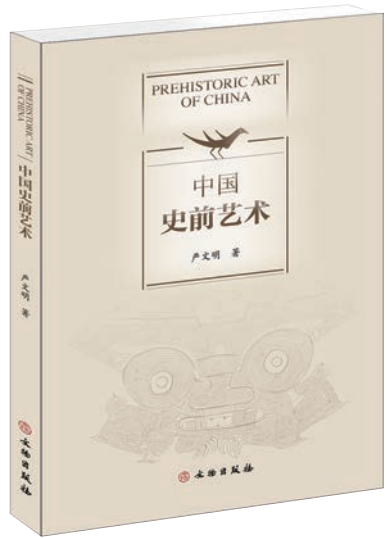


■ 学人著意

《中国史前艺术》前言

严文明



中国史前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人物、动物和几何形图案,而以后者为多,研究的文章和书籍也比较多。前两类虽然也有所关注,但缺乏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因此我想做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兴趣。中国有非常发达的岩画,其中多有人物和各种动物。一般刻画简单,艺术水平不高,特别是年代多不确定,难以取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在史前的艺术品中,人体艺术占有重要的位置。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之初或稍前,吉林的白城双塔一期文化中便发现陶片上有人面纹。稍后在燕辽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中便出现了石雕的人像和小型的人面形象。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状况。使用的材质有石、玉、骨、

蚌、陶等。技法则有雕、塑、绘画、刻画和镶嵌等。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风格,有的表现整体人形,有的只表现头部或面部,还有一些仅仅是像人面的面具。有的重在体形,有的重在表情,有的则高度模式化,似人似神,似乎有神秘的宗教意味。内容可谓丰富多彩。按照各地不同的风格,可大致区分为三大系统,并且各自形成长久的传统。例如内蒙古赤峰地区与辽宁朝阳地区交界地方的红山文化多陶塑裸体人像,明显是秀肌肉。如今蒙古族的男子汉多膀大腰圆,摔跤的时候也是秀肌肉。仰韶文化的人面纹特重表情,陶塑人体和人头也重表情。现在北方的汉人也重情感和仪表。南方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一肖家屋脊文化人头像多拟巫鬼,楚越人也重巫鬼,现在的南方人也多信鬼神。这三个系统

也明显与罐文化、鬲文化和鼎文化三个系统密切相关。传统的力量多么神奇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史前时期都有人体艺术,最早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各地都有一些特色。比较起来,中国史前艺术的特色更为鲜明。这里在前两期后面选了一些参考资料,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比较明白了。中国史前艺术中的动物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有家畜家禽和野兽野鸟,有爬行动物、鱼类和昆虫等,还有想象中的龙凤。艺术手法有绘画、刻画、石雕、玉雕、陶塑、泥塑和模仿动物的各种陶器皿。有时与人物形象的艺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我国史前人体和动物形象艺术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就全国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年代和相应的考古学分

期如下。
萌芽期:
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
发展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
繁荣期:
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3500~前2500年;
转型期:
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2500~前1800年。

《中国史前艺术》
作者:严文明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定价:138元

《浙江古代青瓷》导读

郑建华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系统梳理了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脉络,对各时期、各阶段青瓷的窑场分布、发展轨迹、产业兴衰、产品特征、工艺成就等,做了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对于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诸如原始青瓷工艺是否中断、越窑历史时期与阶段的划分、越窑与龙泉窑的承接转换、乳浊釉青瓷的渊源流变、龙泉窑的起始年代、龙泉窑黑胎青瓷的性质、贡瓷与置官监瓷、龙泉窑和老虎洞窑与哥窑的关系、明代龙泉窑是否存在御器厂等,均阐述了我们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并予以论证,诸如越窑衰落与产业转移相伴随、秘色瓷含义有“两个不一样”、龙泉窑淡青釉与翠青釉青瓷有共存期、吴越国官窑是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官营手工业、余姚官窑运行采取官民合作方式、南宋官窑设立以临安府官窑为基础、南宋官窑系青瓷工艺历经三阶段演进、哥窑缘于“仿官”风尚等。

浙江古代青瓷,不仅历史久远,遗存丰富,海内外的发现既多且广,学界研究成果需参考者亦多,课题研究要想达成理想目标,殊属不易。加之学力不济,又有时限之约,难免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之憾。虽如此,依然期待本书对读者诸君略有助益,期待考古界、史学界、博物馆界、工艺美术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陶瓷鉴赏等领域的人士批评指正。

书籍撰写采取合作的方式,执笔分工如下: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至第三节、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至第四节、第六节,第七章,郑建华;第二章,张馨月;第三章,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八章,谢西营。全书框架构思和统稿工作由郑建华负责。

《浙江古代青瓷》(全二册)

作者:郑建华、谢西营、张馨月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1月

定价:258元

我们明确以下思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既有考古与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采用新材料,选取新视角,运用新方法,得出新结论;书籍撰写,有主有次,力求系统性、科学性和创造性。我们以浙江古代青瓷发展历史为主线,划分出滥觞期、成长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等五大历史时期;以官民两系中的“官”为辅线,还原贡瓷、官窑和哥窑的演化历程;以产品输出和工艺传播为次辅线,介绍青瓷流布与技术辐射范围。我们的论述,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其中又以窑址考古材料为主,文献史料结合使用。我们追求论证的逻辑性,结论的严谨性,对于陶瓷科技考古成果,在有所甄别的同时,尽可能参考借鉴;对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工艺成就,均做专门总结,并注重剖析产品特征与工艺变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考古学和史学视角外,还采用了工艺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我们特别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分析总结浙江古代青瓷的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窑业体系。

深入系统、精深独到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并作出了逻辑严密的详尽论述,其研究成果堪称青瓷研究的一种典范。

该书把窑业文化结构区分出“核心层、中间层、浅表层”三个层次,又在“窑系”时空范围的划定中,划分出“中心区、外围区、辐射区”,并指出窑系界定应在窑业文化结构和文化传播的分析基础上,将时间跨度、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背景诸多因素综合考虑。在具体论述中推出了“越窑”和“龙泉窑”两个代表性窑业系统,兼论其他的窑业遗存。对于学界长期关注的许多问题,也做出了精彩的论述。

出了自己研究后的观点。有些观点显得视觉独特,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本书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或系统理论观点,例如,提出需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窑和窑系问题。再例如,认为杭州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的早期早段产品,都可能曾是南宋朝廷正式设窑之前的临安府官窑产品,以此可厘清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早期乳浊釉产品的工艺技术来源和两窑之间的早晚关系等问题。这些鲜活而有特色的研究思路与观点,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学术价值颇高,是突出的亮点之一。

窑口,以行政区划划分窑系,以造型和装饰等作为产品的研究对象,是传统古陶瓷研究的主要方式。而文献记载常常不够全面,行政区域也时有变更,造型和装饰则是审美情趣的主要反映,凡此种种,既阻碍了研究的进展,亦使许多问题纠缠不清。本书以考古学的分析方法,将窑系的确立标准归纳为核古层(胎釉特征)、中间层(烧成工艺)、浅表层(造型装饰),将不同窑系的分布区域划分出核心区、中心区及外围区,从而抓住了各窑系的本质、分布层次以及彼此的影响等关键要素。

《淮北烈山窑址》读后

孙新民

提起安徽省历史上的瓷业生产,一般会想到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述的六大青瓷窑之一的寿州窑、五代至北宋时期专烧青白瓷的繁昌窑和隋唐生产青瓷延至宋元烧制白瓷的萧窑,上述三窑并称安徽三大名窑。而淮北烈山窑址则是近年来安徽省瓷业考古的新发现,2018年发掘结束时曾召开专家论证会,我应邀参加并考察过现场。近日收到《淮北烈山窑址》考古报告,我为作者在3年多的时间内就整理出版考古报告深感惊讶,而且如此书“后记”中所说“在完成野外考古发掘任务的同时也兼顾报告的室内核对、绘图、描述等整理工作”。我曾任过省级考古单位的负责人,知道各考古单位专业人员太少,往往一个考古项目负责人需要这个工地干完又去忙下一个工地,这样考古发掘资料就会积压被延期整理出版。当然,只要自己挤出时间,边从事考古发掘边整理以往资料,也会加快考古成果的尽早面世。因此,《淮北烈山窑址》考古报告的及时出版,也为我们从事田野考古的同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淮北烈山窑址》考古报告的特色

《淮北烈山窑址》系统整理并报告了2017年和2018年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成果,是安徽省第一部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并出版的窑址大型田野考古报告,将极大地推动安徽瓷业考古的全面开展与深入研究工作。我认为《淮北烈山窑址》报告有以下特色。

第一,该报告做到了发表资料客观真实。由于2017年最初的发掘是地方考古单位抢救性清理,编写者没有予以忌讳,而是详细描述了在发掘过程中存在的失误,真实还原了当时的发掘过程以及发掘者对窑址的逐步认识过程。

第二,该报告遵循客观描述与研究成果分开编写的原则。报告中按单位报道出土遗物,使遗物还原到最初的发掘单位之中,让读者能够了解当时遗物堆积环境 and 遗迹相互之间的关系。为读者利用这批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第三,报告整理引入科技考古参与其中。发掘者与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等科技检测单位合作,针对烈山窑的制瓷技术、胎釉成分、烧成温度、燃料来源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更加科学规范。同时,将科技考古成果作为一章列入文中,而不似以往考古报告将其附录于书后,更加重视了考古与科技两者的结合。

第四,报告采用全彩印刷,把过去放在书末的图版随文字编排。目前,已有多个窑类考古报告将原放书末的图版放于正文中,方便读者对照文字、线图阅读。此报告将所有类别的产品、窑具以全彩照片公布出来,尤其是反映制瓷技术的遗物均采用特写的方式公布,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了解烈山窑产品制瓷技术的发展和演变。

淮北烈山窑发现的意义

烈山窑遗址位于淮北市烈山区烈山村,地处雷河东岸,雷河通过濉河与大运河相连,水运交通便利,烈山窑的产品可以通过大运河向外行销。淮北烈山窑的发现意义重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北方窑业技术向南传播的中转站。烈山窑产品主要有白瓷、青瓷、黄釉瓷以及三彩器,从其陶瓷类器形特征、装烧工艺、陶瓷釉色种类和胎釉料化学组成来看,烈山窑主要受定窑、磁州窑以及巩县窑窑业技术的影响。烈山窑北宋时期生产的白釉瓷器采用了覆烧技术,而覆烧技术是定窑创烧的;金元时期的涩圈支烧技术同样来自定窑的支烧方法。而白地黑花瓷器的发现,说明还受到了磁州窑窑业技术的影响。烈山窑生产有大量白瓷和白地黑花瓷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是白瓷自北向南传播的窑业技术线路图。另外,烈山窑还生产宋三彩器物和建筑构件,出土大量烧造宋三彩的支钉、三叉支烧、模具等,并且在出土器物的枕片和素胎建筑构件上多次发现带有“鞞”字样的遗物。巩县窑是烧制唐三彩的著名窑口,到了宋代虽然衰落,但附近的芝田窑仍在烧制三彩器,表明有巩县窑来到了烈山地区传播宋三彩的烧造技术。

第二,北宋窑炉体量巨大且构造特殊。烈山窑发现的6座窑炉均属于北方典型的马蹄形馒头窑,窑炉建造技术较高,窑炉形体及装烧量较大。

其中Y4窑室面积近24平方米,火膛大而且深,窑炉总长度达12米,这在北方北宋窑窑中体量最大。窑炉依山坡而建,有的窑炉具有一定坡度,便于提高燃烧的抽力。在6座窑炉的火膛中均没有发现炉渣,说明烈山窑宋元时期仍采用柴烧。据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检测结果,烈山窑烧造技术比较高超,在北宋时期可以烧制高温钙釉印花大砖。

第三,向官府和寺院供烧瓷器及建筑构件。烈山窑出土部分瓷器中带有釉彩文字,从文字内容可以确定是供给官府和寺院的瓷器。如彩绘“公用”的青釉罐片、刻划有“丘大人”字样的罐片,表明存在官府定烧的产品。还出土许多特供给佛教寺院用的器物,如彩绘文字“华严”“祐德观”“清淨观”等瓷器,显然属于寺院用器。烈山窑除生产大量日用器物外,还生产一些琉璃龙形建筑构件、琉璃方砖和筒瓦,如黄釉琉璃印花大砖,长宽均为31.5、厚4.5厘米。这类琉璃砖多出高等级的遗址或墓葬中,如广州南汉国官殿遗址中黄釉和褐釉印花地砖,辽代皇族耶律羽之墓出土绿釉琉璃印花大砖等。在开封铁塔的北宋琉璃砖上曾发现有“宿州土吴靖”字样,说明烈山窑生产的琉璃建筑构件很可能供应至京城寺院。

第四,有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宿州窑。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定器》记载:“辉出颍时见房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书中注云:“定器为宋时定州所出瓷器,质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宋政和、宣和年间窑最好,称为‘北定’;其出南渡后者为‘南定’。北贵于南。”金代以仿定窑白瓷为主要特色的宿州窑和泗州窑,位于萧县窑的南面与东南面,与萧县窑接壤并存。叶麟趾先生认为宿州窑在今安徽省宿县,亦仿定器者。胎釉颇似北定,定名终遗之。自定州窑减少以后,市多充定器。宋金时期烈山窑址所在地归宿州管辖,烈山窑的白瓷产品多白釉闪黄,在出土遗物中还发现有“宿”字碗瓷片。据此可知,烈山窑址有可能是上述周辉所述的宿州窑。

当然,《淮北烈山窑址》报告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认识,提出来与作者讨论。由于有的出土器物不完整或太残,在定名时欠准确。如第453页中记述的“支圈”,应该是一个荡箍;第238页记述的“三彩纺轮”,极有可能是1件枕面出檐的三彩枕檐部分。另有个别图号与文字不符,如第701页“图9-1窑棒和垫砖示意图”,而文字介绍的是地层堆积。作者在记述宋三彩和素烧器物时,均称之为“三彩釉瓷”和“素烧瓷”。由于以往出版的考古报告中,有将宋三彩称为“瓷器”的先例,这里不作进一步讨论;但“素烧瓷”只是经过第一次烧制的素坯件,尚没有上釉,还是称素烧器或素胎器为好。

瑕不掩瑜,发掘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整理并出版一部大部头的《淮北烈山窑址》考古报告真是值得称道的,为我们及时了解淮北烈山窑的产品特征和烧制技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淮北烈山窑址》(全二册)

编著: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市文物局、淮北市博物馆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定价:1200元

本书是首部通史类浙江古代青瓷专著。青瓷是最早的瓷器品种,浙江是青瓷的故乡,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历史始于夏商之际,从原始青瓷之滥觞,至明清时期龙泉窑衰落,三千余年间,绵延不绝。在几乎贯穿中国古代历史时期的维度内,浙江地区的瓷业产品,始终以青瓷为主流,名窑辈出,蔚为奇观。浙江古代青瓷不仅以高超的工艺技术执青瓷生产之牛耳,而且与境内外的其他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既表现为大规模的产品输出,也表现为烧制工艺的传播与引进,还表现为审美取向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彼此交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浙江古代青瓷还存在着官民两系,既供给民间社会,也满足朝廷需求。正所谓“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浙江古代青瓷窑业遗存至为丰富,不仅代无所阙,而且分布广泛。这些遗存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门类——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但是,重要性远不只此。对于历史时期考古而言,城址、墓葬、塔基、窖藏、港口、沉船等,出土(出水)的遗物多为陶瓷,瓷器更是大宗。窑窑遗址考古实在有着基础性地位。若不能识别窑口,判断年代,掌握瓷器特征之演变,历史时期考古有时可能会寸步难行。瓷器为博物馆常见的收藏品类,浙江省内的博物馆,更是多数以青瓷为大宗,博物馆的研究和展陈,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形。古代瓷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既是一种经济技术行为,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还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窑窑遗址考古与古代瓷器研究的重要性,还要远远超出考古学本身。浙江青瓷窑址考古与古代青瓷研究,重要性其实无须多言。

2019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课题立项,被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先生邀约承担“浙江古代青瓷”研究。吾因深感责任重大,才学不足,甚觉忐忑。斟酌再三后,方才偕同谢西营、张馨月二位,接受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经反复酝酿,

专家推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任世龙

《浙江古代青瓷》依托考古成果,借助古陶瓷研究科技数据,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厘清浙江古代青瓷发展的脉络及其生产管理体系,总结其历史成就,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就其课题设计和形成的学术成果而言,堪称格局宏大,结构严谨,论述系统,逻辑严密。不仅是浙江古代青瓷研究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也可以说是陶瓷窑址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新的分支学科以来,浙江窑窑遗址考古异常活跃,新成果不断涌现的一次科学总结,可谓新刻度、新标杆。

基于考古学文化分析的“窑窑”和“窑系”,如何与历史上传统的窑窑概念相衔接,是一个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陈元甫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浙江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的青瓷生产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本书抓住了这一古代浙江人民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最大成就和独特贡献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对于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促进作用。

本书以第一手考古成果为依托,梳理历史文献,借助古陶瓷科技成果,对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觉的梳理、研究和总结。资料全面、翔实、丰富、可靠,研究深入细致,是目前第一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胡继根

浙江古代青瓷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浙江研究古代青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江是我国乃至世界青瓷发源地,在业界享有“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的美誉。围绕浙江古代青瓷的各种研究专著和论文数不胜数,但这些研究和争鸣多着眼于某个窑系或某个问题的探讨,鲜有宏观层面的论述。《浙江古代青瓷》以其全面、系统的特点弥补了这一缺

憾,填补了浙江青瓷系统研究的空白。

本书的结构新颖独特。全书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主干,以同一时期不同的窑系为支脉;以科学的考古资料为主,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为辅,全面系统、繁简有序地阐述了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轨迹,各窑系的文化特征及相互关系,既照顾了传统意义上的窑系,又不纠缠其中。为今后编写浙江青瓷史提供了新的视野、构建了良好的框架。

以考古学文化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窑业遗存,是该书又一创新之处。以文献为依据命名